

多余的话

瞿 秋 白

2-1

(3)

多 余 的 话

瞿 秋 白

(反面材料 供批判用)

编 印 说 明

这本材料根据1937年《逸经》杂志第25、26、27三期连载的《多余的话》全文排印，供批判使用。

这次排印前，曾参照1935年《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第6、7、8期所载的三节（《“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改了若干错字，并增补了几处文字，凡所增补，均用六角括弧标明。此外，对明显错误的标点符号，编印时酌予改正；另有三处文字，疑有舛误，因无其他依据，未作改动，加注以供参考。

多 余 的 话

瞿 秋 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084 定价0.15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何必说?(代序)	1
“历史的误会”	3
脆弱的二元人物	9
我和马克思主义	12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18
“文人”	24
告别	31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里^①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

① 疑为“那”字。——编者注。

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十七，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

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

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

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尾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觉〕得好象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

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满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无^①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癆的最危险期逃过了，

① 疑为“去”字。——编者注。

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瞆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呵！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上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

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